

论杨复《仪礼图》与张惠言《仪礼图》之关系

王志阳

(南京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 朱子学派的礼图传统深刻影响了宋、元、明、清各朝的礼学发展轨迹, 而杨复《仪礼图》是其代表性作品。张惠言《仪礼图》是在吸收杨复《仪礼图》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的成果, 成为中国传统礼图的高峰之作。张惠言《仪礼图》继承了杨复《仪礼图》立足朱子学派遵循《仪礼》的传统, 但张惠言《仪礼图》着重于实用性, 而杨复《仪礼图》着力于解读《仪礼》文献, 两者之作图目的不同。张惠言《仪礼图》细化与完善了杨复《仪礼图》所建构的礼图体系。两者之异同根源于各自的时代文化。

关键词: 朱子学派; 杨复《仪礼图》; 张惠言《仪礼图》; 继承; 创新

中图分类号: B24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5)02-0248-08

朱子学派的礼图传统经过朱子、黄干、杨复三代学者的发展, 形成了完整的体例, 而杨复《仪礼图》正是礼学史上第一部依据《仪礼》制作的完整礼图, 是朱子学派礼学思想发展的结晶, 受到后世学者的高度推崇, 具有创始之功。^①而清人张惠言《仪礼图》则是学礼者学习礼学的最重要的作品, 被学界盛赞为礼图的经典之作。^②两者之间的关系从清代开始便已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如陈澧《东塾读书记》:“杨信斋作《仪礼图》厥功甚伟。惜朱子不及见也。《通志堂经解》刻此图, 然其书巨帙不易得, 故信斋此图罕有称述者。张皋文所绘图更加详密, 盛行于世, 然信斋创始之功不可没也。”^[1]清末皮锡瑞更说,“锡瑞案……郑注《仪礼》、贾疏《仪礼》有图, 则自陈氏始发之。杨复图世罕传, 惟张惠言《仪礼图》通行, 比杨氏更精密”,“绘图张惠言最密”。^{[2][32]}陈澧和皮锡瑞比较杨复《仪礼图》与张惠言《仪礼图》的结论较为一致, 都认为杨复《仪礼图》具有创始之功, 而张惠言《仪礼图》则较为精密, 至于两者之间的具体差异则因传统学术重在评点而未及详述, 故我们需要对杨复《仪礼图》与张惠言《仪礼图》进行定量分析, 剖析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一、作图目的不同: 杨复《仪礼图》与张惠言《仪礼图》之区别

杨复《仪礼图》虽是以礼图为名, 是用礼图的形式来解读《仪礼》的作品, 但是其制作观念实传承自

朱子学派《仪礼经传通解》观念, 亦是朱子学派礼学思想成熟期的代表作品, 是宋代礼学的经典作品。清代则是礼学复兴的时代, 考礼、制礼、编礼的作品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张惠言《仪礼图》正是清代礼学作品中的佼佼者。两者分别成为了宋代和清代礼学的代表作品。但就礼图方面而言, 两者之间最根本性的差异是作图目的的不同。

杨复《仪礼图》着重于通过礼图来解读《仪礼》, 礼图的实用目的被放置于次要地位。杨复《仪礼图》的制作原因及体例与朱子学派始终着力于通过解读《仪礼》的学术活动来扩大《仪礼》影响力的目的相同, 正如四库馆臣所言:

序称严陵赵彦肃作《特牲》《少牢》二礼图, 质于朱子。朱子以为更得冠昏图及堂室制度并考之乃佳。复因原本师意, 录十七篇经文, 节取旧说, 疏通其意, 各详其仪节陈设之方位, 系之以图, 凡二百有五。又分官庙门、冕弁门、牲鼎礼器门, 为图二十有五, 名《仪礼旁通图》, 附于其后。^{[3][160]}

四库馆臣道尽了杨复《仪礼图》的编撰原因及其体例, 但是他们对杨复《仪礼图》仍存有多质疑, 如杨复《仪礼图》放弃专述宫室制度。考之《仪礼注疏》, 各种宫室制度的内容主要保存于郑注贾疏中, 而经文部分主要呈现各个礼仪的实行过程。至于宫室的方位与制度则只因陈述礼仪实行过程的需要涉及到而已, 并未专篇阐述宫室制度。杨复严格按照《仪礼》制作《仪礼图》, 正是遵循朱子以解读《仪礼》为主体

的思想。

在制作目的方面，虽然朱子学派代表作品《仪礼经传通解》调整了《仪礼》记文的位置，但是大体保留了《仪礼》经文内容的原有顺序，并以补充其他资料以完善《仪礼》内容为主要努力目标。虽然四库馆臣在提要杨复《仪礼图》时说：“李如圭《仪礼集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皆特出《释宫》一篇以总挈大纲，使众目皆有所丽。”^{[3](160)}但是细考《仪礼经传通解》朱子编撰部分没有“释宫”一门，当属四库馆臣误把《晦庵集》收录的《仪礼释宫》当成《仪礼经传通解》的内容。而朱子在《仪礼经传通解》中未列《释宫》一篇的深层原因是朱子以《仪礼》为主体的礼学思想，其目的正是为了解决《乞修三礼劄子》所言学者忽视《仪礼》的问题，即：“至于其间亦有因仪法度数之实而立文者，则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议，率用耳学臆断而已。”^[4]由此，解决《仪礼》难读的问题，扩大《仪礼》的社会影响力，使其成为后世制作礼仪的依据，成为了朱子学派编撰礼学作品的首要任务。杨复《仪礼图》正是依照朱子礼学思想来制作的作品，这决定了杨复《仪礼图》也是以礼图为手段来解读《仪礼》。

在编撰体例方面，杨复《仪礼图》的各篇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仪礼》的经文内容，而对郑注贾疏的内容仅限于“疏通”经文的目的而酌量删减；第二部分则是依据《仪礼》的经文内容，“各详其仪节陈设之方位”而绘制出相应的礼图。上述体例贯穿于杨复《仪礼图》全书，甚至篇数都与《仪礼》相同，显示了杨复《仪礼图》正是严格依照《仪礼》制作礼图。至于不属《仪礼》经文明确记载的内容，如《仪礼》记文、郑注、贾疏等有关礼仪内容则被统一收录在《仪礼旁通图》内，附于《仪礼图》后，由此也证实了杨复《仪礼图》的首要任务正是解读《仪礼》。

正因杨复《仪礼图》以解读《仪礼》为目标，保留《仪礼》的经义成为杨复《仪礼图》处理经文最重要的原则。与此相反，张惠言《仪礼图》虽然也以经注为依据，却重点关注《仪礼》的实用性。正如阮元《仪礼图序》所言：

昔汉儒习《仪礼》者，必为容，故高堂生传《礼》十七篇，而徐生善为颂，礼家为颂皆宗之。颂即容也。……宋杨复作《仪礼图》虽礼文完具而地位或淆，编修则以为治《仪礼》者，当先明宫室，故兼采唐宋元及本朝诸儒之义，断以经注，首述宫室图，而后依图比事，按而读之，步武朗然，又详考古凶冠服之制，为之图表，又其论丧服由至亲期断之说，为六服加降表，贯穿礼经，尤为明著。^[5]

张惠言的观点正与前引四库馆臣提要杨复《仪礼图》所持观点相合，即习礼者当以宫室制度为第一位，注重礼学的实用性，不同于朱子学派追求以解读《仪礼》为首要目标，而是属于朱子学派编撰《仪礼经传通解》之后的更高目标。因此，张惠言解读《仪礼》的过程注重考查《仪礼》内容的可行性，固然有宗汉的门户偏见因素，但更为深刻的原因是张惠言持《仪礼》在清代具有可行性的观点。阮元说：

予尝以为读礼者当先为颂。昔叔孙通为绵蕝以习仪，他日亦欲使家塾子弟画地以肄礼，庶于治经之道，事半功倍也。然则编修之书非即徐生之讼乎？^[5]

阮元所举叔孙通之事属于礼学史上的大事件，实指叔孙通制作礼仪，而以绵蕝为习仪的前奏。《汉书·叔孙通传》载：

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入绵蕝野外。^{[6](2127)}

颜师古注曰：

应劭曰：“立竹及茅索营之，习礼仪其中也。”如淳曰：“谓以茅剪树地，为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传》曰‘置茅蕝’。”师古曰：“蕝与蕝同，并音子悦反，如说是。”^{[6](2127)}

因此，阮元所言“叔孙通为绵蕝以习仪”正是《汉书》“为绵蕝”以树立尊卑之分的目的。由此可见，阮元把张惠言《仪礼图》定位为与汉代徐生之颂相同，重视其指导学习礼仪的实用性功能，有助于提高学习礼经的效果。注重于佐助习礼者的功能，这不仅是阮元作序之时的感受，亦是张惠言《仪礼图》的礼学影响的重要表现，正如皮锡瑞说：“读《仪礼》有三法：一曰分节；二曰释例；三曰绘图。得此三法则不复苦其难。……绘图张惠言最密。”^{[2](32)}由此可见张惠言《仪礼图》正是通过构筑具体详细的礼图来帮助习礼者掌握礼仪，虽和杨复《仪礼图》有交集，但是其出发点却是着力于实现礼图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二、继承关系：张惠言《仪礼图》吸收杨复《仪礼图》之成果

杨复《仪礼图》以解读《仪礼》为直接目的，而张惠言《仪礼图》则力求礼图的可行性，但是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使《仪礼》能够被理解和接受，为此张惠言《仪礼图》与杨复《仪礼图》有许多共同之处，兹述如下。

前文已言，杨复《仪礼图》是以《仪礼》的经文为主，依据疏解经文的需要裁剪郑注贾疏而成。与之相反，《仪礼旁通图》则是在批判性吸收《仪礼》记文

及郑注贾疏基础上进行制图的。因《仪礼旁通图》篇幅太小,难以全方位呈现杨复对汉唐注疏的态度。成书于《仪礼旁通图》之后的《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则更全面展现了杨复对汉唐注疏的文献思想,即在充分吸收《仪礼》祭礼部分内容的同时,并结合汉唐儒学的礼学实践来编撰作品。杨复把各种历史材料放置于经学的体系内解读礼学内容,以提升礼学的权威性与实用性。正如叶纯芳所言:

最特殊的是他在说解礼仪时,引用前朝或当朝诏令奏议的内容,而评断态度一仍前所述。唯有透过朝臣在朝廷中对经书与礼制的讨论过程,才能证明礼仪真正的实行情况,而不再只是纸上谈兵。杨复从礼学理论的角度对各中礼议进行评断,使朝廷议礼与经学家的学说并列,纳入到同一个礼学理论的框架内,可以说是经学统摄礼制的特例,亦是编撰礼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7]

叶纯芳的研究过程甚为严谨,但是叶纯芳概述杨复处理文献方法之目的结论并不恰当,因为杨复在《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中采纳了众多朝代的礼仪实行情况,并逐一分析各代的礼制规则,而其最终的判断标准则是依据礼经文献,但是这并非为了经学统摄礼制,而是为了使祭礼内容能够具备足够的权威性,最终目的亦如朱子编撰《仪礼经传通解》的目的,即为后世的礼学实行过程提供经学范本。

张惠言《仪礼图》虽然与杨复《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编撰方法有差异,但它是张惠言在吸收汉唐宋礼学成就的基础上创新完成的,进一步提升了其礼图的权威性。阮云《仪礼图序》有言:

编修则以为治《仪礼》者,当先明官室,故兼采唐宋元及本朝诸儒之义,断以经注。首述官室图,而后依图比事,按而读之,步武朗然。又详考吉凶冠服之制,为之图表。又其论丧服由至亲期断之说,为六服加降表,贯穿礼经,尤为明著。^[5]

阮元的判断大体可信,但因书序的文体特征,容易拔高所序之书的贡献。其言“兼采唐宋元及本朝诸儒之义,断以经注”看似客观的评语,实则隐含了张惠言之《仪礼图》吸收了唐、宋、元及清代礼学家礼图的研究成果之意。

单以阮元序文所涉及的宫室图、吉凶冠服制度图表等内容为对象,我们细考张惠言《仪礼图》,看到其《宫室图》有李如圭《释宫》、朱子《释宫》、杨复《仪礼图》的宫室制度内容。至于吉凶冠服制度的图表,张惠言《仪礼图》更是直接引用前人成果,如《五服图》亦与黄干《丧服图式》及杨复《仪礼图》一样,吸收了朱子《家礼》中的礼图成就,而张惠言“六服

加降表”也直接继承朱子学派的礼图系统,并未有实质性创新内容。

又如张惠言《亲亲上杀下杀旁杀》图由朱子学派的《己为本宗服图》^⑧变化而来,其礼图无任何特殊之处,仅是其制表的标准不一样而已。张惠言《亲亲上杀下杀旁杀》是以五服类型来制图,而朱子学派则是以行辈的差别来制图,两相比较,朱子学派的《己为本宗服图》略高一筹。如朱子学派的礼图区分了父在与不在,子对母服丧有“父卒齐衰三年”与“父在杖期”^{[8](2066)},而张惠言的礼图则是仅以守丧时间为期的类型包括己对子、父母、昆弟三种情形,未能区分三者之间的差异,而且张惠言《丧服》图把朱子学派的丧服内容全部放置在《丧服》图中,分类较为模糊。

此外,黄干在《己为本宗服图》之后附有“制服轻重之义”图,其原则正是张惠言《丧服》呈现的正、加、降、不降四种类型,而张惠言把《丧服》的对象按照“至亲期斩”“期亲”“大功亲”“小功亲”“缌亲”“外亲服皆缌”“义服皆加”七种类型。^{[9](卷五)}由这七种类型的丧服构成礼图的横轴,而把黄干《丧服图式·五服图》的十八幅礼图和五服义例全部囊括在内,使丧服图完整呈现在一幅礼图内,减少了朱子学派礼图系统的繁杂程度,便于习礼者把握礼学内容,功劳甚大,难怪阮元、陈澧、皮锡瑞对张惠言《仪礼图》赞不绝口,并推崇为习礼者必读之入门书目了。

从上述三方面可知,张惠言《仪礼图》实际上亦与杨复创作《仪礼旁通图》《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时完全成熟地使用历代礼学成果的方法一样,是在吸收朱子学派礼图成就的基础上创作的。

三、创新关系:张惠言《仪礼图》精密化杨复《仪礼图》

在前引《仪礼图序》中,阮元言及张惠言注重释宫一门,认为这是继承了李如圭、朱子《释宫》的学术传统,但事实上,张惠言与杨复礼学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

其一,张惠言《仪礼图》在杨复《仪礼图》基础上,参考了《仪礼》及其他礼学典籍,修正了杨复《仪礼图》单以《仪礼》经文为依据所出现的某些不够精确之处。如张惠言《仪礼图·筮日》不仅依据《仪礼·士冠礼》及其注疏,而且依据《郊特牲》《士丧礼》的卜日及元代礼学家敖继公的研究成果,使《筮日图》较杨复《仪礼图·筮日图》更为完善,使《筮日图》涵盖了《士冠礼·筮日》与《士丧礼·卜日》的内容,使读者能够在同一平台比较分析两者之间的差异,有

助于掌握相应的礼仪。如张惠言《筮日图》曰：

《士丧礼》卜日奠龟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燂置干燂在龟，东则龟奠席上，与爇为一行，此筮宜在席上，所卦者在筮东，至设筮前则筮人执筮，卦者执所卦亦如《丧礼》卜日。敖继公图以席在筮后，所卦者在筮西，谓当变于筮时。案筮准龟南首，所卦在东，是为在右筮时，卦者在左，则已相变。如敖图反不变矣。又案燂以灼龟，卜人所用，故卜时设龟为右，为便，非取其变。^{[9](卷二)}

张惠言比较分析了属于丧礼的《卜日》与属于嘉礼的《士冠礼·筮日》的异同点。两者的共同点是“所卦者”与“所卜者”均是龟于蓍草之东，而且执筮与执卦之礼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占卜时改变了龟甲的方位，由左变为右，这是为了卜龟时便于灼龟，而不是因为丧礼与嘉礼之间的性质差异。两者内容被置于一处，有利于学习者比较分析士冠礼与丧礼之间的筮日与卜日之礼，容易掌握两者的内容。

与张惠言《筮日图》相比，杨复《筮日图》较为简单，只描绘了筮人、卦者的方位，未体现筮人、卦人方位与《卜日图》的差别，但张惠言《筮日图》与杨复《筮日图》的核心要素未有不同。细考杨复《筮日图》，我们发现杨复虽未在礼图中体现人的变化等细节，但是杨复与张惠言的有司方位依然一致。详见图1和图2。

两图在刻版时所取南北方向有差别，形成方位不一致的错觉。实际上，杨复《筮日图》图向右旋转九十度，则会更为清晰，具体见图3。

比较图1和图3可知，杨复《筮日图》实为张惠言《筮日图》的缩略版。因为两者不仅行礼流程相同，甚至具体的礼节也完全一致。至于《士丧礼》与《士冠礼》之间卜筮者方位差异的问题，杨复在《士丧礼·卜日图》中只直接呈现了卜筮者方位，这是因为杨复以《仪礼》为制图的依据，仅能确定《仪礼》经文呈现的内容，故未有任何对比内容。我们的上述结论不仅获得了杨复《仪礼图》与张惠言《仪礼图》的《筮日图》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两者《卜日图》的证实，因为两者《卜日图》间的差异极小，达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张惠言《卜日图》与杨复《卜日图》，见图4、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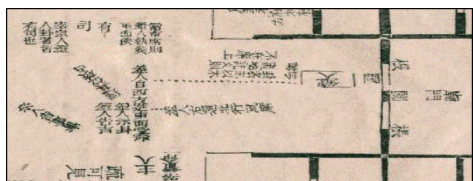


图1 张惠言《仪礼图·士冠礼·筮日》^{[9](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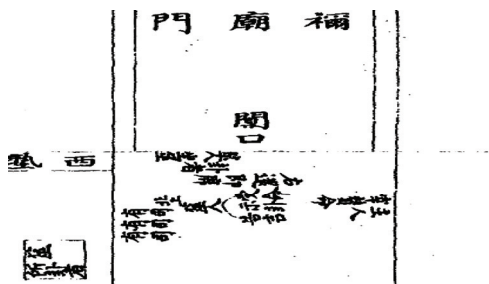


图2 杨复《仪礼图·士冠礼·筮日》图^{[1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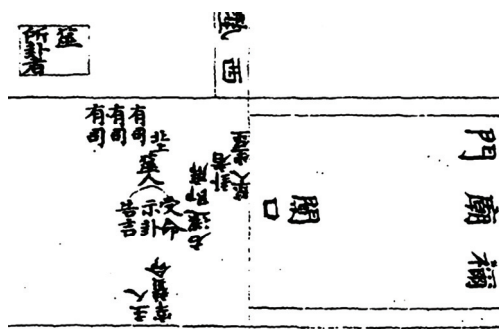


图3 杨复《仪礼图·士冠礼·筮日》向右旋转90度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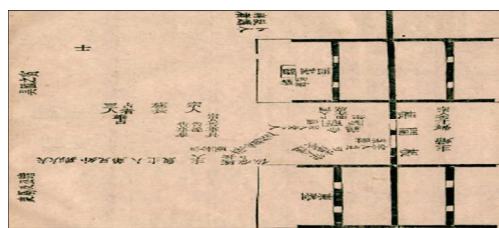


图4 张惠言《仪礼图·卜日图》^{[9](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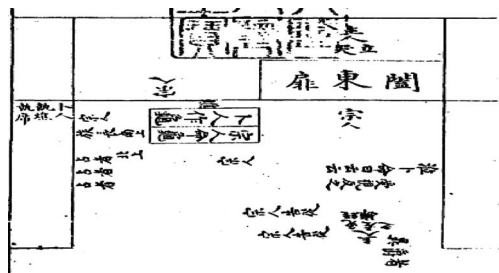


图5 杨复《仪礼图·士丧礼第十二·卜日图》^{[10](231)}

图4、图5的南北方向不同，因此为了便于比较，我们把杨复《卜日图》向右旋转九十度后，南北方位正好与张惠言《卜日图》一致。见图6。

由此可见，张惠言《卜日图》与杨复《卜日图》的相同程度比两者的《筮日图》还高，仅因两者制图目的不同而呈现出详略差异。如杨复《卜日图》中的“主人之左免、拥经”是“主人之左免经左拥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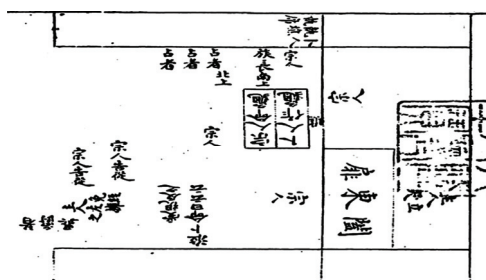


图6 杨复《仪礼图·士丧礼第十二·卜日图》
向右旋转90度图

省称^④，意指主人以左之位的人均与主人着服相同，即免经左拥经。细考《仪礼》经文中仅出现卜人、族长、宗人、主人四种不同身份的人，未明言其他参与者，故杨复《仪礼图》卜日章的经文亦仅出现这四种不同身份的人。杨复严格按照《仪礼》经文来制图，因此不难理解，杨复虽然认为主人之左当有其他参与卜日仪式的人，依然不在礼图中直接体现参与卜日仪式的具体人物身份，仅用“主人之左”来提示尚有其他参与者。而因张惠言以实用性为主要目标，没有像杨复一样严格遵照《仪礼》经文的限定，故明确标明“主人之左”是“主人、众主人、弟兄”。又如杨复仅有“异爵者”排在主人之后，而张惠言依据礼仪的具体情况，确定“异爵者”是“众卿大夫”。对照《仪礼·士丧礼》经文可知，杨复的用语正与经文一致，而张惠言以《仪礼·士丧礼》的经文为基础，结合郑注贾疏及《礼记》的内容，把“主人”确定为宗主与众主人、兄弟，“异爵者”确定为众卿大夫，至于张惠言图中的“诸公及属吏”“异国之宾”则是吸收郑注贾疏及《礼记》的内容来补充《仪礼》经文所缺的内容。此外，张惠言卜图中还有死者之同爵者“士”的位置，则是依据《仪礼》经文“异爵者”推导出同爵者的位置。

由此可见，张惠言《卜日图》与杨复《卜日图》在主体内容方面完全一致，他们的差异仅局限于细节，其根源正是张惠言不局限于《仪礼》经文，还结合了郑注、贾疏及《礼记》的内容，细化了杨复《仪礼图》的内容，完善了礼图的细节，增强了礼图的实用功能。

其二，张惠言《仪礼图》在杨复《仪礼图》基础上细分礼图内容，并依照礼仪的实际应用过程，修订完善了礼图内容。

丧礼是礼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中国人讳言死亡之事的传统，导致丧礼成为礼仪中最不齐全的部分，正如朱子所言：

东坡见伊川主司马公之丧，讥其父在，何以学得丧礼如此。然后人遂为伊川解说道，“伊川先丁母难。”

也不消如此。人自少读书，如《礼记》《仪礼》，便都已理会了。古人谓居丧读《丧礼》，亦平时理会了，到这时更把来温审，不是方理会。^[11]

此条为叶贺孙辛亥(1191)以后所闻录的内容。因文献不足，难以确考东坡讥笑程颐之事的真伪，不过朱子距离程颐仅有几十年的时间^⑤，而且朱子编撰过《伊洛渊源录》及《二程遗书》等，当有文献依据。在士大夫以回到三代为目标的北宋，习丧礼尚且被人讥笑，而且讥笑者是北宋经学史上与洛学、新学并称的蜀学代表人物苏轼，可见当时士大夫对丧事之仪讳莫如深的程度了。

但是朱子不仅提出新观点，而且注重考订丧服制度的内容，引领礼学发展轨迹，成为朱子学派礼图思想发展的基础。

在丧服制度方面，杨复《仪礼图》与黄干、杨复《仪礼经传通解续卷丧礼·丧服图式》均是继承朱子《家礼》，并结合《仪礼》经文注疏而形成的作品。《仪礼经传通解续卷丧礼·丧服图式·衰制》有注语曰：

此图系按先师朱文公《家礼》纂出，仍加领于阔中者，乃与《仪礼》注合。^{[8](2126)}

黄干在《仪礼经传通解》中贯彻的原则是朱子“《仪礼》为经”的思想，并非遵照以实用为目的的《家礼》。上引内容显示朱子学派在编撰《仪礼经传通解》之时与朱子编撰《家礼》^⑥之时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细考杨复《仪礼图》可知，其《衰衣图》亦与黄干《衰制图》相同，仅内容变得更为完整而已，见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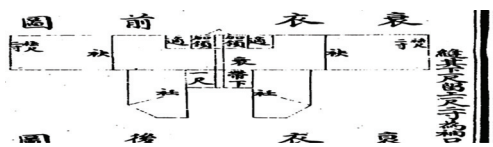


图7 杨复《仪礼图·衰衣图》^{[10](197)}

为了节省篇幅，本文仅引用《衰衣前图》，省略了《衰衣后图》。此图大体与黄干《衰制》图基本相同，仅把衰衣各部分的长短均标于图上而已。此外，杨复亦有“加领”而非朱子的无领的形态，此佐证了杨复《仪礼图》实非如四库馆臣所言完全遵照朱子的思想，也可看到朱子学派的礼学思想从黄干开始偏向于“以《仪礼》为经”的思想。杨复循黄干之例而采用以《仪礼》为依据的原则。与此同时，杨复《仪礼图》把黄干《衰分制图》的注解制作成《裁辟领四寸图》《辟领四寸为左右适图》《裁衽图》《别用布横长一尺六寸广八寸塞阔中为领图》、反摺向前图》《两衽相叠图》。^{[10](196)}

另外,其他差异中最明显的部分当属两者的礼图排序。黄干《衰制》图在前,《衰分制图》在后,而杨复把制作衰衣过程的上述六图放置在前,《衰衣》图放置在后。两者虽属顺序上的差异而已,但是尊重《仪礼》的程度便有重大差别,因为细考《仪礼》经、记、注、疏内容可知,《仪礼》仅载有衰衣各部分规制,并无衰衣完整形态内容。杨复先编纂各部分制作图,再编纂合成衰衣图,严格按照《仪礼》叙述顺序。而黄干先编纂衰衣图再编纂衰衣分制图。至于两者的衰衣后图之间的差异亦与上文所言相同,不再赘述。

与杨复《仪礼图》相比,张惠言《仪礼图·斩衰图》并无多大创新之处,仅单独制作一幅《斩衰前》图,省略了其制作过程。张惠言在衰衣图上标注各项数据,使其规格更为详细直观,但创新程度较小,因为杨复虽未标明具体数据,但杨复已把制作过程及规格已都体现于衰衣制作六图中了。由此可见,张惠言《仪礼图·斩衰图》当是完全承袭杨复《仪礼图》而来。在上述相同之处外,张惠言在继承杨复尊经观念的同时,更注重礼图的实用功能。

在尊经方面,张惠言在杨复基础上更严格按照《仪礼》的内容,因为黄干、杨复都把《衰制》图或者《衰衣前、后图》命名为衰衣,并未严格按照《仪礼》经文,张惠言则严格按照《仪礼》经文把礼图命名为《斩衰前》《斩衰后》。

在实用方面,张惠言注重礼图指导礼仪实践的功能。他在《斩衰前》以图表解说的形式标明此图与其他等级衰衣的内容。他说:

四服之衰唯齐边为异。^{[9](卷五)}

由此指明各级丧服的异同点,使行礼者容易掌握衰衣制度。又因丧服男女有别,而《仪礼》经文却没有女子丧服的内容,故张惠言改变了杨复《仪礼图》忽略妇人衰衣之图的作法,继承了黄干《丧服图式》分别男女差异的制图传统^⑦,制作《妇人衰前》《妇人衰后》图弥补黄干《丧服图式》的《男子成服旁通图》附有《冠裳裳制》的不完整体例,使张惠言《仪礼图》更贴合制图的目标,即指导学者学习《仪礼》的目的。

综上所述,张惠言《仪礼图》是礼学史上解读《仪礼》的必备书籍,影响巨大,它是在充分吸收杨复《仪礼图》基础上创新发展的成果。

四、时代文化:杨复《仪礼图》与张惠言《仪礼图》异同的根源

前面三部分已经详细比较了杨复《仪礼图》与张惠言《仪礼图》之间的关系,但是两本《仪礼图》作

图目的的差异及张惠言继承和发展杨复《仪礼图》的成果关系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杨复和张惠言对待《仪礼图》与《仪礼》之间的关系问题;二是张惠言对待杨复《仪礼图》的评价问题。上述两方面问题的根源在于宋代与清代的学术文化。兹述如下。

一方面,宋代文化高度繁荣,形成了宋代士大夫高度自信的文化,而清代前中期文化则侧重于综合各朝代的学术文化,尤为推崇汉代学术文化,由此形成了杨复与张惠言在处理《仪礼图》与《仪礼》之间的关系时存有不同的作图目的。

杨复处于南宋中期,虽有从北宋着力于外王的政治文化转向偏于内向的理学文化,但是正如余英时所言,“朱熹的时代也就是‘后王安石的时代’”,“南宋士大夫仍然不曾放弃‘回向三代’的理想”。^[12]杨复所处的时代是以超越汉唐,追复三代为宋代士大夫的文化自觉的时代^⑧。与之相关的便是宋代学者以高昂的热情参与政治改革,力求解决政治问题,建立强大国家。故在礼学方面,着重于国家制度之学而切合宋代政治改革需要的《周礼》和侧重于补充和阐述礼义内在礼义的《礼记》成为宋代学者重点研究对象。正是因为面临着宋代文化以追随三代文化为重点,又要解决宋代学者因过分重视《周礼》和《礼记》而导致“咸幽冥而莫知其源”“率用耳学臆断”的弊端,朱子学派以编撰《仪礼经传通解》为手段力求扩大《仪礼》的社会影响力。受朱子学派的影响,杨复《仪礼图》亦以扩大《仪礼》影响力为目标,以解读《仪礼》文本为目的,简化汉唐注疏,解决《仪礼》难读的问题,力求超越汉儒而获得先秦儒学所撰写的《仪礼》经文的真谛,实现宋代儒者追慕三代文化的理想。

与宋代不同,清代的学术文化发端于明末清初,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儒为代表,“儒学由‘尊德性’的层次转入‘道问学’的层次。这一转变,我们可以称它作‘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13]直到以考证学为基础,高度推崇汉学的乾嘉学派而达到顶峰。张惠言生活于清代中期,正是乾嘉汉学高度兴盛的时代,以追慕汉代文化为时代风潮,亦深刻影响着张惠言《仪礼图》的制作。又因《仪礼》之学在汉代已被定为礼经而广受清代学者推崇,而《仪礼》在汉代的最重要特征正是“读礼者当先为颂”“习仪”的实用性礼学。阮元以汉代叔孙通教授礼仪之颂称赞张惠言《仪礼图》,当符合张惠言受乾嘉汉学影响而着力于《仪礼图》实用化以普及汉代礼仪的目标,此亦可获证于前引陈澧、皮锡瑞之评价。由前述可知,一方面,张惠言不仅从行礼流程、方位来重建《仪礼》的行礼过程,更是巨细无遗地把《仪礼》的行礼之人、行礼之物的

摆设,甚至行礼之物的规格都直接标示在礼图中以便学者学习与练习。另一方面,张惠言不仅很好地再现了《仪礼》中的经文内容,而且严格保存了汉唐注疏内容,甚至于在礼图的制作数量及命名方面都力求完整呈现《仪礼》的注疏内容。

同时,清代学者高度重视朱子学派的《仪礼》学,杨复《仪礼图》亦成为清代学者重点吸收和继承的对象。张惠言《仪礼图》便是在时代思潮影响下基于杨复《仪礼图》的成就而发展完善礼图之学,获得了礼图的高度成就。

综上所述可知,张惠言《仪礼图》是在吸收和发展杨复《仪礼图》基础上完成的创新成果。虽然张惠言《仪礼图》只字未提其学术渊源,但较之张惠言《仪礼图》稍早的《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杨复《仪礼图》有创始之功,已然代表了乾嘉汉学派对杨复《仪礼图》的主流评价。再结合《四库全书总目》偏向于贬低宋学的学术倾向,可确定乾嘉汉学派对杨复《仪礼图》的评价已经达到了其时代无以复加的地步。另外,细考“创始之功”的评价,杨复《仪礼图》不仅有首创之劳,还有深刻影响后世礼图发展轨迹之功,表明了《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群体取得了共识:清代的礼图之学实从杨复《仪礼图》的思想观念发展而来。换言之,杨复《仪礼图》深刻影响了清代,已经获得了清代乾嘉学派的认可。因此,杨复《仪礼图》获得清代乾嘉学派的学者高度认可,当亦为张惠言所认可。

上文仅从乾嘉汉学的代表作品《四库全书总目》的观点来推定张惠言亦高度评价杨复《仪礼图》,难免有主观臆断之嫌,实非我们故意如此,而是清代学者,尤其是乾嘉学者,因有门户之见而讳言继承和发展宋代的学术思想。钱穆《朱子学提纲》有言:

清儒于其自立限断之外,全不阑入。尤其如朱子,校《仪礼》少牢馈食礼日用丁巳乃戊己之己之讹,清儒不得不承用,然亦委屈闪避,以引述朱子语为戒。其弟子蔡沈所为《书集传》,清儒亦有沿用,而亦没其名不提。^{[14](182)}

所谓“自立限断”实是清儒推崇汉学而轻视宋学的门户之见。至于“自立限断”的具体内涵,则因《朱子学提纲》仅是《朱子新学案》的提纲,未有深入论述。但是钱穆认为“朱子集宋学之大成”^{[14](23)},其被清儒限定于门户之外,则限断之界当是以汉代学术或者汉学派作品为主要采纳对象,而宋学被排斥于学者学习研究之外,甚至以引用宋学观点为耻。朱子尚且被清儒以“引述朱子语为戒”,则学术地位不如朱子者更是被鄙视和排斥则毋庸置疑了。杨复师从朱子,卒业于黄干,学术地位和影响力无法和朱子相媲美,因

此,张惠言《仪礼图》及其相关文集或作品对自身取法的礼图传统讳莫如深亦属情理之中了。

如果从清代学术风气入手论证张惠言《仪礼图》与杨复《仪礼图》的关系属于间接证据,无法坐实张惠言《仪礼图》与杨复《仪礼图》的关系,那么前文二、三两部分从礼图细节入手分析张惠言《仪礼图》与杨复《仪礼图》的联系与差异,实可证明张惠言《仪礼图》继承和发展杨复《仪礼图》的学术成就了。

注释:

-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杨复《仪礼图》说:“其余诸图,尚皆依经绘象,约举大端。可粗见古礼之梗概,于学者不为无裨。一二舛漏,谅其创始之难工也。”陈澧《东塾读书记》亦称:“信斋创始之功不可没也。”参见[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二〇,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0页;[清]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八,清光绪刻本。
- ② 陈澧《东塾读书记》称“张皋文所绘图更加详密,盛行于世”,皮锡瑞推荐给读者的礼图作品是张惠言《仪礼图》,其理由是“绘图张惠言最密”。参见[清]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八,清光绪刻本;[清]皮锡瑞:《经学通论三·三礼》,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32页。
- ③ 此名为黄干《丧服图式》的名称,而杨复《仪礼图》则直接命名为《本宗五服图》。参见[宋]朱熹等撰,王貽梁点校:《仪礼经传通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6页;[宋]杨复撰:《仪礼图》卷十一,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01页。
- ④ 据杨复《仪礼图》卜日章可知,“主人之左免、拥经”据“主人北面免经左拥之”而在卜日图上体现主人朝向,并添加主人与其他人的方位关系“左”和“之”指代的内容“经”而成。实际上,免经与左拥经是紧密相连的。“免经”郑注“免经者,求吉不敢纯凶”。贾疏云:“此乃主人之服,不纯吉。免经,亦不纯凶也。”并未明言卜宅兆的“免经”与《士丧礼》卜日之处是“免经左拥之”的关系,直到胡培翬才明确两者的关系。据《仪礼正义》筮宅兆章对《士丧礼》“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经”按语曰:“今案:下卜日云:‘免经左拥之’此不言‘左拥之’,省文。当亦与彼同。”则《仪礼》经文中的“免经”实际是指“免经左拥之”的省称。由此可知杨复“主人之左免、拥经”实则已经明确了“免经左拥之”为“免经左拥经”之义。另外,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仪礼注疏》并无郑注贾疏“免经”之文,现据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本补。参见[宋]杨复:《仪礼图》卷十二,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31页;[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疏》卷三十七,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143页;[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王辉整理:《仪礼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6页;[清]胡培翬撰:《仪礼正义》卷二十八,清木犀香馆刻本。
- ⑤ 据吕大临《伊川先生年谱》,程颐卒于大观元年九月庚午(1107)。而据王懋竑《朱子年谱》可知,朱子生于高宗建炎四年庚戌秋九月甲寅(1130),卒于庆元六年三月甲子(1200),则朱子生年距离程颐去世仅有23年,朱子卒年距离程颐去世也仅有93年。据《朱子语录姓氏》,叶贺孙载录上述语录是在辛亥(1191)以后的时间,两者相距也仅有84年左右的时间。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计算,两者相距均未足百年,程颐之事迹尚属朱子的近代史而已。参见[宋]吕大临:《伊川先生年谱》/[宋]

程颢撰、程颐撰:《二程遗书·附录》,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王懋竑撰,何忠礼点校:《朱熹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265-266页。《朱子语录姓氏》/[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346页。

- ⑥ 《家礼》的著作权之争由来已久,但是不管其是否为朱子所撰,均可以代表朱子学术思想,理由有二:一是朱子的弟子陈淳、黄干等均认为此《家礼》由朱子所撰,虽难以据此论定此《家礼》是朱子原著,但是这至少代表了朱子一传弟子们已经难以真正辨别出此书非朱子原著的蛛丝马迹,可见《家礼》是完全符合朱子思想的作品;二是在《家礼》的辨伪过程中,王懋竑最为有力,但是细考王懋竑的作品,我们看到王懋竑对《家礼》的论证过程的内在证据仅是《家礼》细节上的冲突,不足以否定《家礼》作品的内容源于朱子的思想体系。参见王懋竑:《朱子年谱考异》/[清]王懋竑撰,何忠礼点校:《朱熹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13-319页。
- ⑦ 黄干《丧服图式》较为关注男女之间的服饰差异,基本是男女分开陈述的内容格局。如丧服图中《袭经带旁通图》五服中均列男子与妇人,即使完全相同的衣制,已言“小功男子、妇人同”,又有“妇人成服旁通图”与“男子成服旁通图”相对应。参见[宋]朱熹等撰,王貽梁点校:《仪礼经传通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第2118-2132页。
- ⑧ 超越汉唐,追复三代是指宋代士大夫轻视汉、唐,直接以尧舜二帝、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化成绩作为努力的目标,形成余英时所说的“向往三代,轻视汉、唐”高度自信的宋代士大夫文化。详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87页。

参考文献:

- [1] 陈澧. 东塾读书记[M]. 清光绪刻本·卷八.
- [2] 皮锡瑞. 经学通论三·三礼[M]. 北京:中华书局,1954.
- [3] 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4] 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687.
- [5] 阮元. 仪礼图序[C]//张惠言. 仪礼图. 清嘉庆木刻本.
- [6] 班固. 颜师古注: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7] 叶纯芳. 杨复再修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导言[C]//杨复,林庆彰校订. 叶纯芳,桥本秀美编辑. 杨复再修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 台北:中研院文哲所,2011:40.
- [8] 朱熹等著. 仪礼经传通解[M]. 王貽梁点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 [9] 张惠言. 仪礼图[M]. 清嘉庆木刻本.
- [10] 杨复. 仪礼图[C]//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 [11] 黎靖德. 朱子语类[M]. 郑明等校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3108.
- [12] 余英时. 自序二[C]//余英时. 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9.
- [13] 余英时. 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20.
- [14] 钱穆. 朱子学提纲[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ang Fu's *Figure Ritual* and Zhang Huiyan's *Figure Ritual*

WANG Zhiyang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s of Chu His School deeply affect the trajectory of ritual studies in the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Yang Fu's *Figure Ritual*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such works. Zhang Huiyan's *Figure Ritual*, based on inheriting Yang Fu's *Figure Ritual*, develops and innovates, hence becoming the summit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rituals. On the one hand, Zhang Hui-yan's *Figure Ritual* inherits Yang Fu's achievement which follows Chu His School's tradition rooted in *Yi Li*, only that they have different purposes as Zhang Hui-yan focuses on the rituals of practicality while Yang Fu focuses on explanation of *Yi Li*. On the other hand, Zhang Hui-yan's *Figure Ritual* brings about new achievements which are based on Yang Fu's achievement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two stem from their respective age cultures.

Key Words: Chu His School; Yang Fu's *Figure Ritual*; Zhang Huiyan's *Figure Ritual*; inheritance; innovation

[编辑: 颜关明]